

统一以来德国外交政策“正常化”的概念^①

[英]汉斯·昆德纳尼¹

译者:罗湘衡²

(1. 欧洲对外关系理事会, 英国; 2. 南开大学, 天津 300071)

摘要: 在本文中, 我检验了关于统一以来德国外交政策争论中的“正常化”这一概念的使用。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 诸如尤根·哈贝马斯等左翼知识分子倾向于批判“正常化”这一理念, 转而偏好一种基于对以往纳粹时期所应承担责任的德国例外主义的形式。一种建立在“正常化”理念基础之上的外交政策首先与频繁使用军事力量相关, 这一点恰恰是右翼所提倡而左翼所反对的。因此, “正常化”成为了联盟能力的同义词。然而, 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 例如埃贡·巴尔等一些社会民主党人开始使用“正常化”这一概念来指代一种建立在主权以及追求国家利益的基础之上的外交政策。在德国已经出现针对这一外交政策“正常化”的现实主义解读, 并形成共识, 但这并不足以捕捉到统一以来联邦共和国在外交政策领域的复杂转变。

关键词: 德国; 外交政策; 正常化; 集体记忆; 民族主义; 奥斯维辛

中图分类号: D83/8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8049(2014)07-0019-11

一、引言

“在一千年的进程中, 德国人经历了一切, 除了正常化”这是 1945 年泰勒(A. J. P. Taylor)在《德国历史进程》一书中所做的著名论断。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大部分历史被视作一种为获

得这一令人困惑的“正常化”的尝试。然而, 尽管“正常化”的概念业已被左翼与右翼所使用, 但是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以不同的形式加以表现。自统一以来, 这一概念被提倡变革的人频繁使用, 他们在联邦共和国的背景下增加了对“正常化”的呼吁。这一用法暗示在波恩共和国——与第三帝国、魏玛共和国以及德意志帝

收稿日期: 2014-03-14; 修订日期: 2014-05-18。

作者简介: 汉斯·昆德纳尼(Hans Kundnani)是欧洲对外关系理事会的主笔理事, 在这一欧洲的外交政策智库中, 他专攻德国外交政策。他也是伯明翰大学德国问题研究所的一名副研究员。在 2009 年加入欧洲对外关系理事会之前, 他作为一名全职记者以及《观察者报》驻柏林的通讯记者, 著有《乌托邦抑或奥斯维辛: 德国的 1968 年一代与纳粹大屠杀》(伦敦/纽约: 赫斯特/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他在牛津大学研究德语及哲学, 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新闻学。

译者简介: 罗湘衡(1984—)男, 湖南长沙人,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2009 级中外政治制度专业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 德国政府与政治、政治学理论。

①原文以英文刊发在德国出版的《德国政治与社会》学术刊物上。Hans Kundnani, “The Concept of ‘Normality’ in German Foreign Policy since Unification”, *German Politics and Society*, Vol. 30, No. 2, Summer 2012, pp. 38-58. 本文作者同意授权, 并对译者在中国介绍其文表示感谢。

国形成对比——应该被视作“反常的”。

“正常化”这一概念通常与德意志特殊道路——一个存在疑问的表述——这一观念构成对立。最初,它是指德国与其他西方民族国家,尤其是与法国、英国相偏离的极为反常的历史轨迹的史学理论,但是也被更加频繁地用于指无论在消极抑或积极涵义层面上的德国例外主义。德意志特殊道路这一观念与荷尔穆斯·普莱斯勒(Helmuth Plessner)所提出的德国是一个“迟到的民族国家”的理念及其可观察的结果相联系。“正常化”与德意志特殊道路这一对概念在统一以来的论述中也与另外两对互为反义词的概念密切相关:病理与健康以及童年与成年。换句话说,这暗示着波恩共和国在一定程度上或者是神经质的、幼稚的,或者是二者兼备。

在本文中,我检验了自统一以来有关德国外交政策的争论中的“正常化”这一概念的不同用法。在外交政策的争论中,这一概念业已在描述的以及规范的意义被使用。它根据两大主轴——历史的与地理的来加以定义。因此,它由德国自身的历史——尤其与波恩共和国相比较——但是也参照例如法国与英国等其他欧洲强国的外交政策来加以定义。在这个意义上,正如彼得·格罗茨(Peter Glotz)所提出的问题:“为什么我们不能像法国人或者英国人那样?”

我强调在统一以来关于德国外交政策的争论中,“正常化”这一概念被用于三种相互区别却又联系的情况。第一,它被用于描述一个与其过往存在“正常”关系的国家,换言之,一个具有自过去纳粹时代以来的连贯逻辑并且能够自由地追求一种“不受约束的”或者“自信的”外交政策。第二,它被用于描述一个“正常的”北约盟国,一个有意愿并且能够仿效其他北约成员国那样使用军事力量,即强化联盟能力(成为一个有效的北约成员国的能力)。第三,它被用于描述一个“正常的”国家,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一个仿效其他国家的行为方式来追求自身国家利益的主权国家。

出于“正常化”这一概念的三种不同意义,

存在一种以“反常的”波恩共和国时期的某一特征为基础的对德意志特殊道路的可比较涵义。根据对“正常化”的三种含义中的第一条,波恩共和国时期的外交政策是“反常的”,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被以往纳粹时期的历史,尤其是大屠杀所扭曲。根据第二条定义,它是“反常的”,因为存在对其使用军事力量的限制,这阻止了德国像一个“正常的”北约盟国那样履行其承诺。根据第三条含义,它是“反常的”,因为德国不是完全的主权国家,同时或者否认其具有与众不同的国家利益,或者其国家利益从属于欧洲或西方的利益。

二、“正常化”与纳粹时期

统一以后,许多德国左翼人士惧怕联邦共和国会改变对以往的纳粹历史的态度。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纳粹大屠杀成为在西德公共生活中日益强化的居于中心的集体记忆。从1970年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总理在华沙的下跪忏悔到理查德·冯·魏茨泽克(Richard von Weizsäcker)总统于1985年5月纪念德国解放40周年的演讲,德国政治家照例对以往的纳粹历史以及大屠杀作出了悔罪的公开表达。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史学家论战期间,诸如恩斯特·诺尔特(Ernst Nolte)等保守派历史学家主张以往的纳粹历史应该被允许“翻过去”,然而这一立场在当时是声名狼藉的。在柏林墙倒塌之后,“正常化”这一概念最初用于这场仍在持续进行的争论中,简-维尔纳·穆勒(Jan-Werner Müller)称之为“记忆的正常化”。自从聚焦于以往的纳粹历史,这一探讨在很大程度上伴随着历史的而非地理的主轴而产生,它聚焦于底线(对以往纳粹历史的最后红线)的理念。

在这一背景下,“正常化”的概念主要由右翼所使用。另一方面,许多左翼人士拒绝这一概念,因为他们惧怕修正主义、对纳粹大屠杀的相对主义以及一种全新的德国民族主义。甚至于那些接受了统一将会不可避免地制造一种强烈

的德国国家认同情结的左翼人士也拒绝“正常化”的概念。例如,在史学家论战期间,历史学家克里斯蒂安·迈尔(Christian Meier)也谨慎地抵触“历史正常化”的观念。1990年,他在《德国时代周报》提出,统一意味着西德时期的“后国家主义的德意志特殊道路”的终结,并将其称为“联邦共和国的生活谎言”,宣称,“在将来,我们将会对作为德国人,对这个国家感到舒适”。虽然迈尔将波恩共和国与德意志特殊道路相联系,因此暗示其是“反常的”,他说道,持续中的“历史感知的负担”排除了“正常化”的可能性。他总结道,“我们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

底线这一观念暗示了一项“正常的”外交政策,意味着较之波恩共和国时期,德国将会更加自信或者较少受限于以往的纳粹历史。具体来说,这意味着减少类似于勃兰特与魏茨泽克所作出的对以往纳粹历史的忏悔表达。但是,在更加现实的政策领域,左翼也惧怕其所意味的两大方面。第一,它表明由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于20世纪50年代所开启的,与联邦共和国在北约中的成员资格以及欧洲一体化相关的融入西方(与西方一体化)政策的松动。第二,它表明德国军国主义的复苏,一些人主张这同德国的民族主义如影随形。

对“正常化”这一概念最有影响力的批评家之一就是哲学家尤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哈贝马斯长期以来提倡创建一种遵循西方模式的自由的民主政治文化,以便充当融入西方政策的安全阀。尤其是,他提倡一种基于道尔夫·斯滕贝尔格(Dolf Sternberger)所提出的宪政爱国主义理念的“后国家主义的”国家认同。他认为,纳粹大屠杀的记忆是极其严重的,因为尽管联邦共和国在发展一套民主的政治文化方面取得了进步,但是仍有必要牢记:“德国仅仅是在奥斯维辛之后——并且仅仅由于对这一道德灾难的震惊——民主才开始生根发芽的。”“正常化”这一概念含蓄地危害了这一进步,他写道,在统一前的联邦共和国存在一种对他称之为“正常化的辩证法”的解读:只有避免了“正常化”的情

结,才能使“正常化”得以出现。

哈贝马斯将1989年发生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GDR)的民主革命视作一种“追赶式革命”——换言之,东德人正在简单地获得他们的西德同胞很久以前就取得的成就。借助于统一的实现所提供的可能性,他呼吁实行基于《基本法》第146款的全民公决,这将为统一的德国创设一部新的宪法。相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只是简单地依据《基本法》第23款进行了“合并”,6个(包括柏林)新设立的州加入了联邦共和国。在1995年5月的演讲中,哈贝马斯提到1990年缺乏“共和制再造”的结果之一就是“对政治加以自我解读的基本问题——尤其是我们应该如何理解通向柏林共和国的‘正常化’这一问题——依然是开放的”。

哈贝马斯强调某些右翼人士之所以使用“规范的赤字”这一概念,是将其作为延续他们在史学家论战期间所进行的“正常化”争论的一个机遇。例如在1991年2月,他写道,他们目前发觉了“一个翻转在过去的数十年中在精神领域所发生的转变的机遇,并且将扩大的德国置于一个面向‘正常化’的时期,这将最终令我们从自身所犯的诸多罪行的精神创伤中解脱出来,并恢复我们民族的纯洁”。对哈贝马斯而言,“正常化”同对德国历史的校正相联系。他建议,那些主张“正常化”并想取代1945年——对他而言,这一时间点是德意志特殊道路走向终结以及联邦共和国成为西方世界一部分的开始——的右翼人士,1945—1989年是德国历史的中心停顿。这使得1945—1989年期间的历史时段与“被击败与分裂国家的非武装化”相脱节。简而言之,它使波恩共和国进入到德意志特殊道路之中。

在哈贝马斯的观念中,“正常化”的外交政策风险在于会动摇融入西方的政策。因此,他批评历史学家阿努夫·巴林(Arnulf Baring),后者阐述自统一以来,德国“不再是一个纯粹的西欧国家,而是又一次回归了欧洲的中心”。这暗示着融入西方政策本身是“反常的”。与此相反,它也意味着对德意志特殊道路的重新定义。

在统一之前,德意志特殊道路一词倾向于同中部相联系——德国在欧洲位于东部与西部之间的中心位置——业已逐渐被融入西方政策所终结。对哈贝马斯来说,并不主张迈尔所认为的“后民族主义的德意志特殊道路”,而是“正常化”这一理念本身是一个“现实谎言”：“如果出现了一个自1989年以来的第二大现实谎言,那就是我们‘最终又一次正常化了’。在‘同老的联邦共和国告别’这一模棱两可的观念之后,存在一种宽慰感。具体来说,这种‘告别’见诸于某种超越了琐碎的正确与否的奇怪的非理性暗示之上。伴随着一种宽慰感与成就感而作出的“我们最终再一次成为了一个正常的民族国家”的论断,它提供了一种视角,即从联邦共和国——直到近期我们庆祝它作为一个成功的故事——现在显得成了一个真实的德意志特殊道路,因其作为一个被击败与分裂的国家而进行的非武装化而变得更加具体。”

对“正常化”这一理念的第二大批判者是社会民主党知识分子彼得·格罗茨,他在20世纪70年代担任过赫尔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内阁的部长,并且在20世纪80年代任该党的秘书长。在格罗茨看来,“正常化”与德国国家主义的再现如影随形。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于各种期刊所刊发的一系列论文以及1994年重印的书籍,他批评作家博托·施特劳斯(Botho Strauß)以及电影制作人汉斯-尤根·西勃尔伯格(Hans-Jürgen Syberberg)等“正常化论者”,他认为,后者在恢复一种“正常的”德国身份的引导下试图复苏其民族主义。对格罗茨而言,“正常化理论”是“民族主义”的一种“手段”。因此,他称其为“正常化民族主义”。

格罗茨强调自统一以来,右翼人士采纳了德意志特殊道路的理念——这见诸于一套有关“传统的前现代德意志帝国时期的将自身从西方世界撤回的精英所持的特别精神观”的左翼理论之上。甚至令格罗茨更为担忧的是,一些左翼人士也采纳了“正常化”的语言。例如,沃尔夫冈·蒂尔泽(Wolfgang Thierse)在1991年

夏天所撰写的论文中提出作为拒绝民族国家的替代,德国应该旨在成为“一个相对平静与轻松的,并因此成为一个相对正常的欧洲民族国家”。格罗茨认为,蒂尔泽与其他左翼人士为了营造偏好于“正常化”的论战,他们有效地放弃了“在历史上有可能的道德进步的观念”。换言之,“正常化”取代了规范性。

哈贝马斯与格罗茨为德国外交政策的连续性作了有效的辩解。尤其是,他们批判融入西方政策的松动以及德国外交政策的“再武装化”。在科尔(Kohl)时代,对外交政策的两大担忧中的第一点并未具体化:德国依然坚定地成为西方世界的一部分。实际上,与弗朗西斯·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一道,科尔继续推动欧洲一体化的进程。1992年签署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完备地创建了欧洲单一市场,并为欧洲货币联盟奠定了基础,德国马克被欧元所取而代之。然而,德国受到了来自其北约盟国,尤其是美国日益增大的压力,借以改变德国针对使用军事力量的态度。于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关于“正常化”的争论日益聚焦于左翼人士所持的第二大外交政策担忧:哈贝马斯称之为德国外交政策“匍匐而行的军事化”。

三、“正常化”与北约

德国统一以来,“正常化”这一概念的使用源于1991年海湾战争的背景环境,当时一些人提倡变更《基本法》以便允许德军在未来参加“防区外”行动。在海湾战争之后的数年内,德国在解决族群和区域性冲突时,扮演了积极的角色。尤其是巴尔干半岛的冲突方面遭遇了日益增强的压力,在20世纪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有关德国外交政策的争论主要被运用军事力量这一问题,尤其是联邦国防军执行“防区外”任务的部署问题所主宰。这与“正常化”一词开始主要被用于外交政策的争论这一背景相对应,最明显的莫过于基督教民主联盟(CDU)。因此,哈贝马斯说道,海湾战争充当了“正常化”这一论战的“催化剂”。与之相类似,格罗茨于

1991年写道,以海湾战争为起点,右翼人士开始运用被他称为“正常化的主题”以带来联邦国防军角色的转变。

最早以这种方式来使用“正常化”这一概念的右翼人士之一是作为基督教民主联盟议会党团外交政策发言人的卡尔·拉莫斯(Karl Lamers),他在1990年8月(换言之,甚至在正式统一之前)强调,德国需要变革其针对运用军事力量的态度以便成为一个“国际社会的正常成员”。“我深信从历史中吸取正确的教训是必要的,因为那是我们一切争论的背景。在该案例中,我想从历史中获取正确的教训意味着,即使我们对于使用军事力量保持完全的克制,以至于我们完全想要维持并且必须维持这一政策,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军事即使在当今的世界也发挥着作用,并且在这一点上我们将不得不成为国际社会中的正常一员。”

与之相类似,国防部长福尔克·鲁厄(Volker Rühe)成为20世纪90年代初允许联邦国防军参与维和行动的关键人物,他强调,德国在1991年具有“取得信任与进行正常化的权利”。与拉莫斯相仿,鲁厄认为,“正常化”见诸于以往纳粹历史的教训之上,或者说它未必预示着一一种底线。在这一背景下,“正常化”几乎成为联盟能力的同义语,或者说,能够履行其作为北约成员国的(军事)承诺。例如在1991年海湾战争之后,身为基督教民主联盟议会党团副主席的卡尔-海因茨·霍恩许斯(Karl-Heinz Hornhues)提议修订宪法,以允许德军参加维和行动。他说就德国所承担的联合国承诺而言,这一举动将使联邦共和国能够成为“一个正常的联盟成员国”,并且“完全有能力履行其作为联盟成员国的承诺”。

与此同时,左翼人士在这一背景下围绕联邦国防军的角色以及“正常化”这一概念产生了分化。联邦议院中的社会民主党成员诺伯特·甘索(Norbert Gansel)于1991年为使联邦国防军发挥更大的作用作出了努力,他说“正常化不仅是指世界的其他地方,也涵盖德国人

所希望的再次统一的德国”。大致在同一时期,社会民主党前任汉堡市市长克劳斯·冯·多纳依(Klaus von Dohnanyi)强调德军参与联合国的维和任务。“尤其在德国20世纪历史的背景下,还有什么能够比履行这一使命更为自然和正常的呢?”但是,许多其他的左翼人士惧怕德国外交政策的一种“再军事化”。因此,在1995年有关联邦国防军是否作为派驻波斯尼亚的快速反应部队的争论期间,社会民主党的甘特·费尔霍伊根(Günter Verheugen)强调德国应该追求一种“非暴力的外交政策”,并说到德国在这一领域不能作为一个“正常国家”。

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些左翼人士改变了他们针对军事力量这一问题的态度。一个关键的节点在1995年的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这推动了诸如绿党领导人乔斯卡·费舍尔(Joschka Fischer)等一些人修正他们先前对运用军事力量的反对,并倾向于人道主义干涉的理念。然而,他们经常借助于德国具体历史的教训以使这一转变系统化。尤其是,他们强调德国具有一项防止纳粹大屠杀的历史重演的特殊责任。因此,即使他们改变了对使用武力的态度,依旧继续拒绝“正常化”的概念并主张从一种强调德国例外主义的视角出发。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这也能够被视作建立在源自德国的“纳粹大屠杀身份”的“消极的民族主义”基础之上的新德意志特殊道路的一种形式。

这场发生于20世纪90年代期间以对军事力量的运用为中心的“正常化”的争论是一种理想主义的形式,左右两翼都利用以往纳粹的历史来为支持抑或反对“正常化”。它遵循历史的与地理的主轴而发生——换言之,它通过对德国的过去以及与其他国家的对比等途径来定义“正常化”。然而,在关于20世纪90年代末在柏林建立纳粹大屠杀纪念馆的争论这一背景下,一些人却又一次开始挑战以往纳粹的历史在德国公共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尤其是马丁·瓦尔泽(Martin Walser)在1998年10月于法兰克福的圣保罗大教堂所做的演讲,再次开启了有关底线的争论。瓦尔泽在演讲中谈到了如果某人阐述到

德国人是“十分正常的”所受到的猜疑。

这场新的底线之争发生于1998年秋季“红—绿”联合政府形成之时,瓦尔泽的观点与新任总理格哈德·施罗德(Gerhard Schröder)的观点广为契合,后者似乎较之其前任或者费舍尔对以往的纳粹历史具有截然不同的态度。他似乎含蓄地认同了瓦尔泽关于纳粹大屠杀较之充当外交政策的根基而言,更是一项私人事务的争论。新任外交部长费舍尔强调德国外交政策的连续性,而施罗德似乎倾向于变革。在担任总理后的首次演讲中,他谈到了“一个成长的国家的自信”,并将追求其国家利益,尤其在欧洲联盟中的利益。不仅在外交政策领域,即使在内政中他也使用“正常化”一词,施罗德曾提到其竞选就是一次“民主正常化的表达”。因此,他经常在媒体上分辨一个“不受约束的国家”这一理念,它将要追求一种“正常的”外交政策。

“红—绿”联盟政府的首次外交政策危机是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当时关于使用军事力量的争论在德国达到了顶峰。费舍尔将德国参与北约应对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Slobodan Milosevic)的种族清洗政策而采取的军事干涉这一事例同奥斯维辛相联系。另一方面,施罗德使用了“正常化”的话语来论证德国参与这场战争的合法性,例如1999年2月,施罗德在慕尼黑安全会议所做的演讲中提到德国并不想追求一条德意志特殊道路,并准备“作为一个正常的盟友”那样来承担责任。虽然费舍尔与施罗德都同意政策本身,但是他们所使用的话语体系之间的差异表明了“正常化”这一概念的弹性,这也显示出一些左翼人士目前业已准备仿效20世纪90年代初基督教民主联盟所做的那样,将“正常化”的概念适用于德国外交政策。然而,极为重要的是施罗德采用了右翼的观点,将“正常化”定义为联盟能力。

四、“正常化”与国家利益

由于施罗德是首位不再拥有1945年记忆的联邦总理,因此通常从代际的领域加以解释他对

“正常化”这一话语的使用。然而,费舍尔等与施罗德同一代的其他人具有对以往纳粹历史的截然不同的态度。除此之外,瓦尔泽并非1968年一代中的一员,但却属于旧有的高炮连助手的一代(出生于20世纪20年代晚期与30年代初期)。事实上,赞同左翼所提倡的“正常的”外交政策的人中,最为明显的是埃贡·巴尔,他出生于1922年,曾在德军(专指1935—1945年间纳粹德国的军事力量)中服役。作为勃兰特的原外交政策顾问以及新东方政策的设计师,他在德国外交政策的争论中是一位具有影响力的人物。尤其是施罗德承认巴尔是其外交政策的主要影响力来源。例如,在巴尔离任后,他认为在外交政策中存在“勃兰特与埃贡·巴尔所构思与随后赫尔穆特·施密特所延续之间的联系”。

1999年1月,巴尔在外交政策期刊《国际政治》上所刊发的一文中,要求“德国政治的正常化”。巴尔通过欢迎瓦尔泽在数月之前的演讲,尤其是他对奥斯维辛的“工具主义”的批评来开启全文。巴尔说道,问题在于目前德国是否能够获得一种“内在的平衡”以使其能够“像国际社会中的其他国家那样来行动”,以及“这种正常化是否能够被其他国家所理解与接受”。自统一以来,德国当前已经获得了完全的主权,它具有“一种责任”来创造这种“正常化”。纳粹大屠杀不应该“阻碍通向正常化的道路……过去历史的污点不应该衡量未来”。对瓦尔泽在法兰克福演讲的回应显示出德国人依然不是一个“完全正常的民族”。但是,目前德国已经统一并重获主权,因此自然而然,它拥有一次“正常化的契机”。实际上,他总结道:“柏林共和国将象征着德国的正常化”。

巴尔有效地将底线这一理念直接适用于外交政策:德国外交政策必须脱离以往纳粹历史的“污点”以便实现“正常化”。巴尔进一步解释在外交政策领域意味着什么:融入西方政策以及欧洲联盟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德国问题”,这意味着德国不再是对欧洲其他国家的威胁。此外,还暗示着德国应该“以类似于其他主权国家的相同自然方式来追求其利益。这将是正常化的——也

是柏林共和国的机遇”。因此,不同于遵循着右翼将“正常化”与联盟能力相联系的施罗德,巴尔用追求国家利益来等同于“正常化”。正如冈瑟·赫尔曼(Gunther Hellmann)所指出的,巴尔所撰写的文章暗示着波恩共和国的外交政策是“反常的”——并非因为其对使用军事力量的犹豫,而是由于德国不具有完全的主权。

巴尔赞同瓦尔泽,并认为奥斯维辛阻碍了外交政策的“正常化”,这是一种对费舍尔所持的以纳粹大屠杀为中心的德国外交政策观的含蓄批评。随后,费舍尔被指控“工具化”奥斯维辛来论证德国参与科索沃战争的合法性,而巴尔将之视作一场“侵略战争”。但是,巴尔也强调德国与美国之间的利益正在分化,他认为在后冷战时代的世界,“美国与欧洲之间的利益不再如先前那样相互一致”。因此,巴尔认为,“正常化”意味着与美国日益拉大距离。换言之,他要求松动在统一之后诸如尤根·哈贝马斯等一些左翼人士所惧怕的融入西方政策。

自巴尔将“正常化”等同于追求国家利益,以及他认为德美利益并不一致的观点越来越具有现实意义。在“9·11”事件之后,施罗德总理承诺德国对美国“无限的团结一致”。在首次援引《北大西洋公约》第5条集体安全条款之后,德国派兵参加“持久自由行动”以及随后在阿富汗的“国际安全援助部队”的任务。显然,忠诚于联盟或者对北约效忠的理念依然是德国外交政策的指导方针。然而自2002年以降,由于美国入侵伊拉克的可能性增大,施罗德开始反对布什政府的政策,不再强调联盟能力。

随着伊拉克战争的临近——恰逢2002年德国大选以及对“二战”期间盟国对德国城市的轰炸这一集体记忆的流露相一致——很多社会民主党人提出德国对伊拉克战争的反对是一种“正常化”的表达。例如,议会领袖弗朗茨·明特费林(Franz Müntefering)在2002年10月宣称自统一以来,德国成为了一个“正常的国家”,并且与巴尔相似的是也将“正常化”与追求国家利益相关联:“目前,德国是一个具有权力与责任来为欧洲的成功做出贡献的正常国家。格哈德·施罗

德总理做了这些事:自信地追求德国的利益——在近期再次得以显现——然而也需要确定的是,德国将对欧洲的进一步发展做出贡献,并且它依然是一个和平、民主与繁荣的地区。”

因此,在伊拉克战争即将到来这一背景下,一些左翼人士,尤其是社会民主党人采纳了一种对“正常化”的新定义,即作为一项基于追求国家利益的外交政策。与先前将“正常化”视作联盟能力的理念相类似,它又一次暗示了波恩共和国是“反常的”,并用于论证联邦共和国外交政策转变的合理性。虽然,先前将“正常化”视作联盟能力的观念被用于论证同德国的北约盟国在外交政策抉择上相一致,例如科索沃战争以及向阿富汗派兵的部署;这一新定义也能够被用于论证德国与其盟国,尤其是美国在外交政策领域的分化,例如对伊拉克战争的反对。

五、“正常化”与“特殊性”

尽管如明特费林等一些社会民主党人使用了“正常化”的概念,但是施罗德在2002年大选期间也提到了“德意志道路”或者“德国道路”,这唤起了对德意志特殊道路的记忆,似乎是在反对“正常化”的理念。(作为施罗德的竞选策划人,明特费林在该用语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明特费林离任后,施罗德谈到该用语的首要含义是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因此成为一种对“盎格鲁—撒克逊经济模式”的批判,但是也同外交政策相联系,尤其包含“对勃兰特的和平政策的借鉴”。但是自2002年8月于汉诺威的一次选举集会上首次使用该用语之后,施罗德倾向于强调该用语社会的与经济的内涵,而非外交政策元素。

然而,巴尔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所出版的一本书中,选择了施罗德“德国道路”这一理念外交政策方面的内涵,并将其直接同“正常化”的观念相联系。在德意志道路中,不言而喻它是正常的,他要求:“一个如正常国家那样追求其利益的服务于欧洲的德国,并且不让其未来被过去所牵绊:欧洲的未来比德国的过去更

加重要。”在1999年,被定义为追求国家利益的“正常化”是一个核心概念,它强调一种国家认同的理念是“正常的”,并且德国受到了一种国家认同赤字的伤害。巴尔写到:“德国人完全具有一种责任来发展一种与国家观念相似的正常关系。”他对费舍尔的奥斯维辛“工具论”的批判甚至比1999年更为明显:“一个正常追求其利益并尝试实现其目标的国家不应该被过去的历史所麻痹。我们不能脱离自身的历史。虽然我们不应该尝试去逃脱,但是也不应该被过去所捆绑。德国人最终必须祛除当他们尝试解决眼前的问题而回望过去时的反常趋势,因为这将使寻求明日之答案时更为艰难。当然,抹去发生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史无前例的工业化灭绝行为是不可能的。但是,奥斯维辛不是一个恰当的为德国参与科索沃或者阿富汗战争寻找合法性的论点。那些人之所以惧怕正常化,是因为他们牢记着德国再一次正常化是依附于过去,并偶然地被历史所捆绑。我们必须根治自身的精神重担以愈合精神心理层面的创伤。过去不应该阻碍未来。”

伴随着对基于以往纳粹历史的德国例外主义的批判,巴尔较之他在1999年所撰写的文章更加强调一种具体的德国元素的外交政策的必要性。实际上,他将“正常化”辨别为“特殊性”——换言之,一条具体的国家路径。他不仅认同施罗德的“德意志道路”这一概念,但是他也说到对施罗德将之局限于社会领域感到遗憾——较之外交政策而言——他称之为“对特殊性的恐惧”。巴尔甚至力促德国人克服自身的“对德国模式的恐惧”。他提到,其他欧洲国家对其自身独特的道路感到自豪。“只有德国人担心他国恐惧德国道路,但其实德国道路不再令人害怕了。”很明显,巴尔的“正常化”意味着继续走自己的道路。

他继续强调,德国在使用军事力量的问题上应该走自己的道路,并认为,裁定联邦国防军参与或者准备一场侵略战争属于违宪的《基本法》第26条,是德国“特殊性”的积极组成部分。德国若能够发展出自身与众不同的外交与安全

政策,这甚至能够成为一个“独特的卖点”。为了维护德国不愿使用武力的政策,巴尔找出了20世纪90年代早期“正常化”的最初用法。在当时,右翼人士主张“正常化”意味着在运用军事力量的问题上与其北约盟国相趋同,而左翼人士却认为存在“再军国主义化”的危险。然而十年后,巴尔强调“正常化”意味着走自己的路,它表明保护与维持其不使用军事力量的政策。为了使“正常化”同“特殊性”相一致,巴尔利用“正常化”的概念来为德国例外主义辩护。

如同他在1999年所做的那样,巴尔也再次强调了德国的国家利益——这构成了一种“正常的”外交政策的基石——亦不再与美国相协调。他写道,“目前,在大西洋两岸存在不同的利益,并且将延续下去”。德国需要终结美国对其外交与安全政策的统治权,以便避免沦为美国的保护国。巴尔进一步建议德国作为一种和平力量的身份——其唯一的卖点——将有助于同美国相区分。借助这样的理念,巴尔以承认“我能够看到伊拉克战争的有利之处”来开启全书也就不值得大惊小怪了。随后,他建议伊拉克战争有助于团结德国人,“对伊拉克战争的回应是泛德意志主义者”。

巴尔所提出的一种“正常的”德国外交政策的观念是现实主义的,因为它基于主权的概念,这首先要求德国追求其自身的国家利益。德国不应该如20世纪90年代那样深受奥斯维辛的影响,但是也不必担忧走自己的路,特别是当它代表和平的时候。实际上,对使用军事力量的犹豫正是其“特殊性”的精髓。另外,尤其在运用军事实力的问题上,它也应该有别于并准备挑战美国。这是一种建立在原有的“永不再战”的训诫之上,而非“永不再奥斯维辛”的基础之上的外交政策,它在20世纪90年代获得了极大影响。虽然“正常化”的论述伴随着格罗茨所恐惧的国家主义复苏,但是它不会出现一些左翼人士所预想的军国主义复苏。甚至,浮现出的是一种以德国作为一种和平力量的观念为基石的左翼国家主义。

虽然施罗德在科索沃战争时将“正常化”等

同于联盟能力的做法与巴尔不尽相同,但是在伊拉克战争之后,他日益认同巴尔关于德国外交政策的理念。虽然他说在离任后,开始偏好于提倡“主权”而非“正常化”,但是他认可巴尔对基于“主权”这一理念的外交政策的现实强调,并追求德国的国家利益。他赞同巴尔提出的以往的纳粹历史不应该被用于论证德国的外交政策选择,并批判费舍尔援引奥斯维辛的例子以证明对科索沃进行军事干涉的合法性。与巴尔相仿,他也认为伊拉克战争是一次德国走自己的路并寻求与俄国实现“特别关系”的机遇,这被他视为勃兰特新东方政策的延续。当被问及是否后悔同美国疏远,他回答绝不:“我的政府要求实现决策的独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提到不仅在竞选期间,即使在其余时期德国外交政策应该在柏林而不是其他地方所做出的原因。如果你愿意,就能成为信条。”

六、现实的共识

在“红—绿”政府于2005年卸任之时,外交政策分析专家相信德国在两种意义上已经变得更加“正常了”,这分别发生于20世纪90年代与21世纪初。首先,身为英国中—左翼智库——欧洲改革中心负责人的查尔斯·格兰特(Charles Grant)承认,施罗德“具备勇气来主张德国应该像其他中等规模的发达国家那样,准备通过部署武装力量来强化其外交政策”。因此,他与费舍尔值得因“赋予德国一项更加‘正常的’外交政策”而得分。然而与此同时,“正常化也预示着一项更为专断的德国外交政策”。根据格兰特的观点,“施罗德同其他后冷战时代的德国总理不同,他公开地谈论德国的国家利益”。

这种双重的“正常化”发生于被称为联邦共和国的“瓦尔泽化”这一背景下。自千禧年以来,存在一种将德国人从作为犯罪者到成为受害者的集体记忆的转变。有关伊拉克战争的争论是一个关键的节点,因为它以全新的视角聚焦于德国人作为“二战”期间盟国轰炸的受害者。在这一背景下,比尔·李文(Bill Niven)记

述了一种“历史的去情境化”战略。此外,以纳粹大屠杀为中心的记忆的重要性也在下降,因此,目前纳粹大屠杀较之20世纪90年代而言,在德国政治文化,尤其是外交政策争论中所起的作用日益减少。诺伯特·弗莱(Norbert Frei)将这称为一种“记忆的去分化”,它与对纳粹大屠杀以及“二战”的集体记忆相关联。

作为施罗德继任者的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总理在一定程度上抵制这一趋势。与施罗德相比,默克尔明确地承认了德国对以往纳粹历史的责任,并且从未试图使以往纳粹的历史“正常化”。她对德国与以色列之间的双边关系做出了特别的承诺——而巴尔并未将其纳入精心构建的德国国家利益之中。较之施罗德,她强化了德国与以色列以及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间的关系,采取措施以对伊朗政权施加更大的压力,迫使其停止核计划。然而除了与以色列的双边关系之外,在施罗德治下德国外交政策转变的途径在默克尔时代仍在持续。

特别是,默克尔延续了正如施罗德所说的对德国国家利益的系统化,并且自信地追求之。因此,她对欧元危机的回应被广泛地视为一种“正常化”的表述。一位德国评论员认为默克尔的回应显示了“德国应该成为一个具有自身利益的十分正常的国家”,并且一位美国专栏作家认为,在柏林所见的“正常”事物是一个“镇静的自利的德国”。财政部长沃尔夫冈·朔伊布勒(Wolfgang Schäuble)拒绝了类似对德国政策的批评,他说:“在重新统一后的20世纪90年代,欧洲的每个人都应该说德国最终应该成为一个具有一套正常外交政策的正常国家。现在德国已经是一个正常国家了,但是他们仍然不高兴。”

这些案例显示,虽然对于“正常化”是否值得期待以及关于具体的德国外交政策抉择依然存在分歧,但是当前围绕巴尔提出的将“正常化”这一概念等同于一种基于追求国家利益的外交政策这一观点存在一个共识。目前,左翼与右翼均频繁地使用“正常化”这一概念。只不

过极少与20世纪90年代所提倡的联盟能力这一概念相关,右翼与左翼都更加经常地将其与“国家利益置于首位”相关联。此外,在过去的十余年间,国家利益日益从经济角度加以阐释,具体来说,为迎合德国出口商的需要,同期他们创造了GDP增长2/3——不同往常的高比例。因此似是而非的是,“正常化”这一概念目前被广泛地运用,即使是非直接的,以论证一种极不寻常的出口导向型外交政策。

以往的纳粹历史有时依然能够影响关于“正常化”的外交政策争论。例如在2010年4月,评论家克劳斯-迪特·弗兰肯伯格(Klaus-Dieter Frankenberger)在《法兰克福邮报》通过援引国家利益与以往纳粹的历史两方面对“正常化”作出了定义。他说,德国的盟友要求其“摒弃加于自身的历史重担,并自信地追求其利益——换句话说,实现正常化以取代大力宣传纯正的理想主义以及仿佛像一个放大的瑞士那样来行为”。但是他也提出,“由于德国以前处于欧洲中部的地位,难以像其他中等强国那样实现正常化”,并总结道,德国人将不得不接受“他们不能实现彻底的正常化”。

然而,目前有关“正常化”的争论主要产生于地理的,而非历史的主轴。换言之,自“正常化”被定义以来,它就以其他的欧洲中等强国为参照。克劳斯-迪特·弗兰肯伯格将德国与“其他中等强国”进行对比,蒂莫西·加顿·阿什(Timothy Garton Ash)在2011年3月写到:“德国业已成为一个类似于法国与英国的‘正常’国家”。即使“正常化”的概念只用于描述的层面,其定义仍有问题。虽然法国与英国在面积上同德国相当,但是它们二者具有产生于自身地理与历史条件的外交政策特殊性、传统以及偏好。与德国不同,法英两国拥有广阔的前殖民地、核威慑力量以及联合国安理会的永久席位。

因此,如果参照法国与英国的情况,那么德国外交政策能够在对国家利益加以系统化的方面被视为日益“正常的”,很明显在使用军事力量的意愿方面依然在一定程度上是“反常的”。在20世纪90年代,特别在科索沃战争前后,德

国的安全政策在协调自身以运用军事力量作为一种外交政策工具的层面上,似乎与法国和英国逐渐趋同。但是最近数年以来,由于德国平民在阿富汗所遭遇的意外不断增加,德国公众对国际安全援助部队的任务以及在海外部署德军等事项变得更加不信任。一个关键的节点在2009年9月,当时一名德军指挥官召唤美军对昆都士进行空袭并导致平民伤亡。针对德军卷入防区外行动的反对之声,促成了2011年3月德国在安理会有关对利比亚采取军事干预的投票中保持克制,而这一军事行动由法国与英国挑起。在安全政策领域,德国似乎并不想在地理意义上得以“正常”。

因此,最终“正常化”这一理念并不足以捕捉到统一以来联邦共和国在外交政策领域的复杂转变。即使它被用于描述,也只能有选择地适用。如我在其他场合所强调的,一种更好的协调基于对国家利益加以系统化的德国外交政策的“正常化”以及德国安全政策“反常化”的方式或许是“地理—经济学”的概念。在德国统一前后,爱德华·鲁瓦克(Edward Luttwak)预测在后冷战时代的世界,一些国家在其国际交往中将增加对“商业方式”而非“军事手段”的运用,但是仍将延续一种“对抗性、自相矛盾与零和的”“冲突逻辑”。因为德国较之法国或者英国等其他可比较的中等强国更为回避“军事手段”,它应该被视作一种“地理—经济强国”,而非只是“正常的”。

译后记

德国经历了1949—1990年长达41年的分裂阶段,在此期间联邦德国(西德)全方位反省了1933—1945年期间的纳粹统治,尤其是1939—1945年期间的战争责任,最终确定了以“和平主义”与“欧洲主义”为支柱的外交政策。遵照战后德国政治家的期许,上述政策旨在重拾曾经倍受纳粹德国侵略、欺凌与屠杀的周边国家的谅解与信任,以期“面向西方”、“融入西方”并重归“欧洲大家庭”的怀抱;与此同时,通

过大力推进以“联邦主义”为指针、以“法德轴心”为内核的欧洲一体化进程,在促成“欧洲联合大业”的前提下,为重新跻身地区强国并以之为“跳板”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影响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德国上述谋求摆脱战败国的心理阴影最终实现国家外交政策“正常化”的举动,最终凭借“柏林墙倒塌”以及1990年10月3日东西两德统一得到了验证。

较之德国,日本的命运无疑是令人唏嘘的。由于“同盟国集团”并未参照由苏、美、英、法四大国分区占领并致使德国分裂的“德国模式”来惩办日本军国主义,转而由美国近乎一手包办与独揽了日本战败后的处置问题,这就未能从根源上铲除日本军国主义的滋生土壤。日本以保留天皇制为条件方才在投降书上签字的事实,也使得日本从未彻底反省“二战”中的侵略罪责。与德国总理勃兰特先生在“华沙犹太人纪念碑”前的下跪相比,战后日本政要(除极个别以外)不仅从未彻底省罪,反而参拜靖国神社、篡改历史教科书、否认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歪曲慰安妇的事实、抹杀对受害国在政治/

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欺压等“荒谬言行”更是频频上演,更有甚者竟然声称日本发动战争是为了将亚洲诸国从英美等西方国家的殖民统治中解救出来,等等。上述举动严重伤害了曾经受到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亚洲国家人民的感情,造成相关国家难以重新建立起对日本的政治信任,妨碍了当事国对日本的外交关系,更是导致日本的“国家形象”在中、韩等国民众中始终未能彻底回归正常。

与其说日本在谋求“正常化”,倒不如说日本与“正常化”背道而驰,越发成为一个不正常的国家。一个对自己的战争罪行拒不深刻反省的日本,将永远走不出战争阴影对它的束缚;一个不尊重历史、不懂得感恩、只知攫取和占有的民族,将永远难以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日本只有勇于面对不堪回首的侵略历史、承担战争责任、反省侵略罪责,才能获得亚洲周边邻国的谅解与信任,并为重新崛起成为亚洲大国乃至世界大国获取“政治选票”。

编辑 罗凤灵 肖琳

The Concept of “Normality” in German Foreign Policy since Unification

Hans Kundnani¹

Translator: LUO Xiangheng²

(1. *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London, United Kingdom*; 2.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Abstract: In this paper I examine the use of the concept of “normality” in debates about German foreign policy since unification. In the early 1990s, left – wing intellectuals such as Jürgen Habermas tended to criticize the idea of “normality” in favor of a form of German exceptionalism based on responsibility for the Nazi past. A foreign policy based on the idea of “normality” was associated above all with the greater use of military force, which the right advocated and the left opposed. Thus, “normality” became a synonym for Bündnisfähigkeit. Yet, from the mid 1990s onwards, some Social Democrats such as Egon Bahr began to use the concept of “normality” to refer instead to a foreign policy based on sovereignty and the pursuit of national interests. Although a consensus has now emerged in Germany around this realist definition of foreign – policy “normality”, it is inadequate to capture the complex shift in 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Federal Republic since unification.

Key words: Germany; foreign policy; normality; collective memory; nationalism; Auschwitz